

·中外文化交流·

闽刻《十三经注疏》山井鼎手校本价值考论

王 晓 静

内容摘要:山井鼎是日本享保年间取得经学校勘里程碑地位的第一人,他的校勘成果萃为《七经孟子考文》二百卷,并被中国乾嘉学者卢文弨、阮元广泛采用。关于山井鼎足利校书的时间、过程,今借助日本京都大学藏山井鼎手校本,才可以给出具体的结论:集中在享保五年秋、享保七年八月十三日到享保八年十一月廿五日两个时间段,持续到享保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此时间内完成了《礼记》、《尚书》、《周易》、《春秋左传》、《毛诗》、《论语》、《孟子》七经及古文《孝经》的校勘。手校本以闽本为底本,保存了山井鼎校经的原始面貌,直观体现了山井鼎以版本对校为主的校勘方法,同时提供了大量不见于《考文》的条目、按断,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山井鼎 足利校书 《七经孟子考文》

日本享保年间(约清代雍正年间)的经学家、校勘学家山井鼎,是系统校勘《十三经注疏》并取得里程碑地位的第一人,他的《七经孟子考文》(以下简称“《考文》”)在中国校勘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卢文弨、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都大量采用了山井鼎的成果。但是山井鼎的校经活动,世人仍然不能道其详,今据日本京都大学藏山井鼎手校本《十三经注疏》,结合其他零星记录,考之如下。

山井鼎本姓大神氏,又名重鼎,字君彝,号昆仑,通称善六^①,是日本江户时代攘园学派大儒荻生徂徕的高足,也是日本校勘学史上极为重要,且对中国清代乾嘉时期的经学校勘有重要贡献的人物。其一生精力,萃为《考文》一书,成为《十三经注疏》校勘史上的开山之作。该书初刻于日本享保十六年(清雍正九年,1731),清代乾隆时期传入我国后,被收入乾隆御纂《四库全书》,其成果被卢文弨、阮元等大量采用。研究山井鼎校勘学术者,日本学者如狩野直喜、森铣三、川瀬一马,国内学者顾永新等,亦无不极重此书,先后为之作考述,论

①参藤井明:《山井昆仑》—《山井昆仑の生涯・昆仑の姓氏、字、号はと》,藤井明、久富木成大合著:《山井昆仑·山県周南》,《日本的思想家丛书》18。承南京大学博士生、日本北海道大学特别听讲生杨柳博士提供此书图像,特此致谢。

其成书、卷帙、方法、价值、流传等诸多问题。然关于山井鼎校经的详细情况，木城问亭《山井昆仑事略》、宇佐美惠助《山井家传》及狩野直喜《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考(附著者山井鼎传)》等多语焉未详。今杜师泽逊教授主持《十三经注疏汇校》，汇聚十三经中外历代善本及前人各种校勘成果于校经处，笔者有幸参与《周易注疏汇校》，对山井鼎《考文》及相关研究渐为熟悉之后，亦颇疑惑于山井鼎校经始末及细节。遂勤加搜罗，知日本京都大学现藏有一部带有山井鼎识语的明代嘉靖福建李元阳刻本《十三经注疏》，又借助京都大学网络之便，得见此本全部彩色图像。经过仔细研究，确认此本为山井鼎手校本，保留了山井鼎校经事迹及《考文》成书之前丰富而翔实的材料。今据山井鼎手校本识语，广徵载笔，撰为小文。

山井鼎为中国学者所熟知，有赖《考文》一书。是书乃山井鼎眷录其七经、《孟子》校勘记编次而成，初成于日本享保十一年（1726）。享保十三年（1728）正月，山井鼎病卒。其后物观为作《补遗》，于享保十六年（1731）合成《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刊行，而《考文》无单刻行世。今得见山井鼎手校本，于山井鼎校经之细节及《考文》一书原貌之考察不无裨益。

山井鼎手校本今存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经部经注疏合刻类著录：“《十三经注疏》，嘉靖中福建刊本，有山井鼎、山井璞助识语，南葵文库图记。”^①查验原书图像，诚如《目录》著录。其中《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七经有山井鼎校语及跋识。校本每册卷首多钤有“纪州德川南葵文库”朱文方印，又有“山井氏图书记”、“山鼎之印”、“昆仑”、“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等印及“重鼎”花押，每册末多钤有“君彝”朱文印。书中校语繁多，又多见校书题识，署名作“重鼎”、“山重鼎”、“昆仑山人”、“山井重鼎君彝父”等，可见此本确为山井鼎所藏并手校之本。书末有狩野直喜跋云：“《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孟子》，以上有西条儒臣山井鼎校语，疑《考文》所本。”狩野直喜亲见此本，却仅书一跋，不另撰专文考述，盖以手校之本，丹黄交错，颇难梳理理也。

前人对山井鼎校勘诸经情况的了解，大多从《七经孟子考文》而来。山井鼎的老师物茂卿《七经孟子考文叙》云：

下毛之野有野参议遗址，乃数百年弦诵之地焉。纪人神生夙有好古癖，偕州人根逊志者往探之，获宋本《五经正义》，文具如弇州之言，而较之明诸本，其所缺失皆有之，纰缪悉得。又获七经《孟子》古本及《论语》皇疏，较之，其经注颇有异同，而古时跋署可徵，亦唐以前王、段、吉备诸氏所藏来，存于此而亡于彼也。生喜如拱璧，遂留三年，罄其藏以归。^②

整体记述了山井鼎校七经《孟子》所获诸本及其来源、价值、校书所用时间等。

①(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日本株式会社同朋舍出版，1981年，第3页。

②(日)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卷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影印享保刻本。

又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凡例》云：“今曰七经者，据足利学所有也。臣鼎赐告三年，校书其中。”有此两处明文，“三年”遂成为诸家考论山井鼎校书时限的一致说法^①。然山井鼎前往下野国足利学校的时间、校书“三年”的起止、校勘诸经的先后、校勘的内容、校书所用版本、根逊志在校书中所起的作用等诸多具体问题，《叙》及《凡例》中并无明确交代，《考文》也未详细记录。而山井鼎校本中保留的诸多批校、跋识，却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而有序的材料。

一、前期校书工作及足利校书的时间

山井鼎在足利学校校书，诸家皆统而言之曰“三年”，而何时前往足利学校，前人或避而不谈，或如狩野直喜所说“已不能知”，仅能据徂徕序“留三年”之说，推测“盖在享保七八年之既”^②。今通过联缀山井鼎校本保留的诸多跋识，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足利校书的始末。如《毛诗注疏》卷二十之四末页云：

《五经正义》总八十八本，对校所输一再或三。始事于往岁八月十三日，终功于今兹畅月廿二日。中间微恙，药饵之给未尝遑暇，魔魅不殄，僥功踰期，为达者嗤耳。时享保八年昭阳单阏十一月廿五日足利学中志。
南海学生山井重鼎君彝父。

此乃对校完足利学校藏本《五经正义》所记。由此可以看出，享保七年（1722）八月十三日，山井鼎已在足利学校，并展开校讎《五经正义》的工作，至享保八年（1723）十一月廿二日，完成了《五经正义》全部八十八本的对校工作，用时十五个月，可谓速矣。然在此次集中校勘《五经正义》之前，山井鼎对足利学校藏本已有所探究，并进行了一些校勘工作。如《礼记注疏》卷五十二《中庸》篇首页题识云：

享保庚子秋九月廿四日，与友生伯修来于足利，以学校所藏《五经正义》校讎《中庸》篇，补磨灭。学校本，金泽文库之本也，其后上杉宪实寄附当学云，盖宋板也。中华所希有之物，而于我邦得见之，惟不离羈绊终其功也。得再就当学补其阙，斯余之意也。

庚子为享保五年（1720）。是年秋，山井鼎对足利学校藏《五经正义》的版本、来源已有明确的判断，以之校讎《礼记·中庸》篇，且有“终其功”之意。庚子秋九月廿四日，为校本诸题识中最早的时间，在此后的几个月中，山井鼎仍然在校《礼记注疏》。即其识语可以获得详细过程：

享保庚子冬十月，以万历板校讎。君彝。（卷五十首页“礼记注疏卷第五十”下）

①(日)藤井明《山井昆仑》六《昆仑の足利行·足利学校における昆仑·武夷》根据昆仑手校闻本《十三经注疏》识语中最早和最晚的日期，确定山井昆仑享保五年到享保九年四年在足利学校。这是目前所见唯一利用校本资料者，惜所述过简，又有不够准确之处。

②(日)狩野直喜：《七经孟子考文考文补遗考》，(日)内藤虎次郎等著、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下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261-262页。

享保庚子冬十月十七日校讎，补磨灭。此日过赤城，遇暴雨，沾衣而归。(卷五十第二十一页首行栏外)

庚子冬纪州山井善六重鼎校。(卷五十一首页“礼记注疏卷第五十一”下)

是享保五年可视为山井鼎在足利学校校书的开端。

从享保五年庚子九月至享保七年壬寅八月，两年的时间中，山井鼎主要在进行《春秋左传注疏》及《礼记注疏》的校读，尤以《春秋左传注疏》为主。今录其识语如下：

辛丑二月读。(卷一末)

日东享保辛丑二月廿八日重鼎句读。(卷六末)

享保辛丑春三月九日，快晴。青山白莲精舍东窗校。(卷七第十三页)

辛丑春三月十一日句读。(卷八末)

辛丑三月十五日句读。(卷九末)

辛丑三月廿日青山白莲精舍校。(卷十末)

辛丑三月廿日句。(卷十一末)

辛丑三月廿二日句。(卷十二末)

辛丑三月廿七日句读。(卷十三末)

享保六年辛丑四月二日东都青山白莲精舍校。(卷十四末)

辛丑四月四日句读。重鼎。(卷十五末)

辛丑四月十二日纪府京兆家史山井善六句读。(卷十六末)

辛丑四月十五日山重鼎君彝父句读。予将欲之足利学校校讎宋板《五经正义》，豫与万历板本参校。(卷十七末)

辛丑四月十六日句读。(卷十八末)

辛丑四月十七日句读。(卷十九上末)

辛丑四月廿四日句读功成。重鼎。(卷十九下末)

辛丑四月廿五日东都青山书院东窗下句读。大神重鼎。(卷二十末)

辛丑五月十一日句读终。俗纷旷日，可以恨也。重鼎。(卷二十一末)

辛丑五月十二日校讎。匪夷阁主人。(卷二十二末)

辛丑五月十四日句读终。君彝甫。(卷二十三末)

辛丑五月十三日功就。重鼎。(卷二十四末)

“匪夷阁主人”，应为山井鼎之别号，未见诸家记载。辛丑为享保六年(1721)，从以上可知，这一年二月到五月中旬，山井鼎进行的是《春秋左传注疏》的校读工作，几乎一两日或三五日便句读完一卷，地点在东都青山书院白莲精舍。然自卷二十五至卷六十，识语中所记时间不再见辛丑年。盖因此时“俗纷旷日”，故未能终其卷。除《春秋左传》外，此年应该还进行着《尚书注疏》的校读。如《尚书注疏》卷四《大禹谟》第十六页“顺帝初摄帝位”行上，山井鼎校并记：“‘帝’一作‘舜’。十一月十七日夜。”《皋陶谟》卷末记：“享保辛丑冬十一月十七

日过,读《大》凡山房一宿,而翌日归家。”又卷五《益稷》首页次行云:“享保辛丑冬十一月十八日石叔潭、根伯修来会白莲精舍。”《尚书注疏》校本题辛丑年者仅此三条,可知享保六年,山井鼎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春秋左传注疏》的校读。

享保七年壬寅八月足利行之前,《礼记注疏》成为山井鼎主要的校理对象。其识语有曰:

壬寅春三月朔补完。昆仑山人。(卷九第四十二页)

壬寅三月十二日青山白莲社补完。(卷十二第二十六页)

壬寅夏四月十三日补。足利行未决。(卷十三第二十二页)

壬寅四月十五日补。余有足利行志,公命未下,豫补其漫灭,为宋板校雠之助。(卷十三第二十九页)

壬寅四月十七日始功。足利行未决。(卷十四第一页首行)

壬寅四月廿三日补完。足利行犹未决。(卷十五末)

享保七年壬寅夏五月十日补完。昆仑山人。(卷六十一末)

壬寅五月十三日补完。(卷六十二末)

壬寅五月十三日补完。(卷六十三末)

以上跋识忠实地记录了享保七年三月至五月中旬山井鼎校补《礼记注疏》的情况,而所署“昆仑山人”乃是山井鼎的别号,向未被学者所提及。《礼记注疏》之外,他经亦偶见壬寅春夏间的题识。如《尚书注疏》卷八《咸有一德》自“河亶甲居相”至“作祖乙”,嘉靖李元阳本原阙,山井鼎补抄后题:“壬寅四月八日补写。”《春秋左传注疏》卷二十七李元阳本原阙第二十八至第三十二页,山井鼎补写毕题曰:“享保壬寅五月六日青山白莲精舍补写。”以上题识皆是补完李元阳本阙文后所题。

识语又屡次言及足利行之事。山井鼎于享保五年秋已去过足利学校,用其所藏宋板校雠《礼记·中庸》一篇,享保六年春,已有往足利学校校雠宋板《五经正义》的想法,如上所录《春秋正义》卷十七末页题云:“辛丑四月十五日山重鼎君彝父句读。予将欲之足利学校校雠宋板《五经正义》,豫与万历板本参校。”时隔一年,迟至享保七年(1722)五月初,足利校书仍未成行,如《周易注疏》卷五后所记:“壬寅五月初八补修毕。梅雨未晴,四处萧条,独迟足利行之命下耳。重鼎记。”山井鼎于题识中屡言足利校书尚未成行,可见其心情之急切。而这两年中对《春秋左传》、《礼记》、《周易》、《尚书》四经,以李元阳本为底本,参照万历本进行的补写以及校读,都是前往足利学校集中校雠《五经正义》的前期工作。

山井鼎具体在享保七年某月某日动身前往足利学校,何日到达,校本诸题识中无明确记载。不过综合以上题识,当是在享保七年夏秋间前往足利学校,并于是年八月十三日正式开始宋板《五经正义》的校雠工作,如上《毛诗注疏》卷二十之四末页所记云。历时一年多,到享保八年(1723)十一月廿五日,山井鼎以李元阳本为底本,完成了足利学校藏宋板《五经正义》的对校。但这并不意味着山井鼎校经工作的结束。次年,山井鼎仍然不断有重校。如《论语正义·论语注疏

解经序》首页所书：“凡青笔从皇侃《义疏》本，所引一本，足利学所藏何晏《集解》本也，与皇疏本合。其所同异，别记‘一本作某’，以备参考云。享保甲辰春二月四日记。”又卷四末页云：“甲辰二月朔再校了。此日乡书至，在堂亲无恙，告有马行来。”又《礼记注疏》卷二第十六页“不得远也”句，山井鼎校语末署“甲辰九月朔”。甲辰即享保九年，一直到是年十一月，山井鼎仍然有校。如《毛诗注疏》卷八之一末页“毛诗注疏卷第八”行后云：“甲辰十一月十四日校《经典释文》。”又如《春秋正义》卷四隐公九年“君为三覆以待之”，注：“覆，伏兵也。”山井鼎于“也”字下加小圈，页眉墨笔校曰：“永怀堂板覆扶又反，下同。今校诸本无此音义，据彼补之。癸卯秋七月七日足利学校寓居。重鼎志。”又墨笔书：“据《经典释文》，覆扶又反，注及下同，伏兵也。今本脱，当补入也。甲辰十一月十七日京都青山旅次校。”甲辰十一月十七日，是校本中能够见到的最晚的时间。

综合以上所论，山井鼎最早去足利学校在享保五年秋，利用所藏宋板校讎《礼记·中庸》篇，对足利藏本的情况及价值有了明确的认识，并有校完《五经正义》宋板之志。此后的两年中，山井鼎以明嘉靖福建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本为工作本，对《春秋左传》、《礼记》、《周易》、《尚书》四经进行句读，并用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本作为校本，进行先期的补写工作。从享保七年八月十三日到享保八年十一月廿五日，山井鼎得以在足利学校集中完成宋板《五经正义》的校讎。到享保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山井鼎仍然利用足利本进行一些重校、补校。如此算来，山井鼎校讎诸经前后用了五年的时间，足利校书最集中的时间有十五个月，诸家所云三年，当是算上享保九年尔。

二、足利校书详考

足利学校所藏《五经正义》宋本，乃上杉宪实捐赠，享保五年山井鼎和根本逊志曾往足利学校一探究竟。享保七年八月到达足利学校后，山井鼎利用足利所藏，集中对《周易》、《尚书》、《礼记》、《毛诗》、《左传》五经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校勘。

山井鼎最先校者，为《礼记正义》。《礼记正义序》第一页首行“礼记正义序”下题曰：“享保七年壬寅秋八月十三日以足利本校讎。”校宋本五经自此日始功。每日校毕，山井鼎皆于页眉记下校书时间、地点、天气或校补情况等，这是我们考察山井鼎校书先后、起止时间最为直接的材料。如《礼记注疏》卷一《曲礼上》第二十七页“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行上记：“八月十四日校。终日雨甚。”卷二《曲礼上》第九页“凡为长者粪之礼，必加帚于箕上”行上记：“八月十五日校。晴。”卷五《曲礼下》第十五页“天子之妃曰后”行上记：“八月廿二日校。雨乍晴。”第三十页“天子上不视于祫”行上记：“壬寅八月廿三日足利学里校。雨。”卷十八《曾子问》，李元阳本“盖贵命也”下疏文“之奠以其无尸故也……不陈币玉也”及“子游问曰：丧慈母如母”至“丧慈母。自鲁”皆阙，山井鼎补写后记曰：“以万历本补写。至终余八字空位何故？生字盈缩，他日得嘉靖

板全者可校耳。壬寅九月廿六日。”如此之类甚多。从所记日期看，山井鼎校书每日少则五六页，多则一二十页，几乎无间断。若有事不校，亦记下缘由。如《礼记注疏》卷十三《乡射礼》首页右栏外记曰：“九月十三日校。十日游于岩船，十二日反归，三日不校。”一一排比较本上题写的时间，《礼记注疏》最晚者为卷六十三《丧服四制》末页所记：“享保七年壬寅十二月十三日，足利学宋板校讎功成。重鼎。”则是日山井鼎完成《礼记注疏》的校勘工作。从八月十三日至十二月十三日，山井鼎用四个月的时间校完了《礼记注疏》。

享保八年(1723)正月二十五日，山井鼎开始《尚书注疏》的校勘。《尚书正义序》首页右栏外，山井鼎书：“癸卯正月廿五日校。雪。”癸卯为享保八年，《尚书注疏》校讎自此日开始。与校勘《礼记注疏》一样，山井鼎亦逐日记下时间、天气、校补等情况。梳理题写的时间，可知是年二月初一山井鼎校完前三卷，到二月十五日校完第十二卷，三月初一校到第二十卷，卷二十首页“文侯之命第三十”行上记：“三月朔校。阴。”卷二十末页记曰：“享保八年癸卯正月廿五日始功，三月朔终。南海学生山重鼎识。”前后三十馀天，山井鼎便完成了《尚书注疏》二十卷的校勘，可见进展之速。

享保八年三月中旬，山井鼎开始《周易注疏》的校讎。《周易注疏》李元阳本题作《周易兼义》，卷一首页“周易兼义上经乾传第一”行上书：“癸卯三月十八日校。雨。”《周易正义序》末，山井鼎记曰：

以上诸文足利学校所藏宋板阙而不备。享保癸卯三月十九日足利学校东塾，南海纪府学生山重鼎君彝校。（“重鼎”花押）此日同舍伯修之东都，独居太闲，以朱墨点此序讫云。小林书青。木治辅亦来，雅谈有趣。伯修，即享保五年同往足利学校之友生，名根本逊志，号武夷，武州弘明寺人^①。狩野直喜云山井鼎享保五年前往足利，“亦赖之（根本逊志）为东道”^②。这次足利校书，根本逊志亦为之辅助。识语中所说“小林”，尚难考其详。所谓“书青”，盖指此跋后以青笔所书“足利写本有三通，间有异同，予一以青笔记之，不一一识别也”及校语中青笔所记者。《周易兼义》九卷、《略例》一卷、《释文》一卷，卷帙较《礼记注疏》、《尚书注疏》为小，但校勘过程却并不顺利。考察山井鼎识语，可知其先校的是《周易略例》，次校《周易兼义》九卷。其《略例》后墨书有曰：“享保八年春二月初七，南海纪府学生山重鼎寓乎东海野州足利学，以所藏《周易》校辅嗣所著《略例》上下篇云。时俗客满座，厌倦，不知所言。”由上文已知享保八年二月山井鼎在进行《尚书注疏》的校勘，《周易略例》所载“二月初七”，在《尚书注疏》中也有体现。《尚书注疏》卷第八第一页第一行右栏外记：“二月七日校。阴。”则此日山井鼎同时校勘《尚书注疏》和《周易略例》。但二月七日后，不见山井鼎校《周易注疏》的记录，直到三月初一完成《尚书注

①根本逊志的家世谱系、生平事迹，详(日)石井光太郎撰《根本武夷に就いて》一文。

②(日)狩野直喜：《七经孟子考文考文补遗考》，(日)内藤虎次郎等著、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下册，第261页。

疏》，三月十八日才又开始《周易注疏》的校雠。其后的跋识有：

癸卯三月十九日同校伯修归省。寻遭姊之丧，六月十六日归学，翌日十七日再从卷首始校云。（《周易兼义》卷一首页页眉）

六月十八日。（卷一屯卦卦画行上）

六月十九日。（卷二大有卦“大有元亨”行上）

享保癸卯季春廿八日，微雨萧条，独在足利之塾，校谦、豫二卦。时伯修归。卿独校宋板，姑俟重校云。（卷二末）

六月廿日。雨。（卷三复卦“复亨”行上）

癸卯夏四月初五校阅毕。（卷三末）

六月廿一日。雨。（卷四“周易兼义下经咸传卷第四”行上）

六月廿二日。晴。（卷四损卦卦画行上）

六月廿三日校。雨。（卷五鼎卦“鼎元亨”行上）

艮卦为难读也。姑俟再读。癸卯六月八日。（卷五艮卦卦画行上）

六月廿四日校。晴。（卷六节卦卦画行上）

六月廿五日校。阴。（卷七系辞上“正义曰圣人有以至如兰”行上）

六月廿七日校。晴。昨日一口日，有祭礼，乡人演戏，校书有阙。（卷七系辞上“正义曰天一地二”行上）

六月廿八日校。阴。（卷九“周易兼义卷第九”行上）

享保癸卯夏六月廿八日覆校功毕。（卷九末）

所记时间有三月、四月、六月，尤其集中在六月中下旬。原因在于，《周易兼义》宋板先是伯修所校，山井鼎覆校，而享保八年三四月间伯修遭家姐之丧，六月十七日方恢复校书的工作。此后几乎无日不校，所以仅用十一天，六月二十八日就完成宋板的覆校。宋本只是校雠《周易兼义》的版本之一，山井鼎还利用足利学校藏写本校雠《兼义》，时间延至享保九年。如卷九末页青笔记曰：

右青笔，以足利三通写本校。三本同者不以识别，旁加其字。但《系辞》以下传一本具焉。尔时享保甲辰三月十日赤城校。

赤城，当即《序》末山井鼎所说“小林书青”之“小林”。而《略例》的校勘，写本之外，另有活字本。山井鼎校曰：

足利书本无“魏”、“撰”二字。按活字本有邢璫注，即今本所有也。最后得之校云。足利古本无注。（《略例》第一页第一行右栏外）

足利古本即写本。

山井鼎着手《春秋左传注疏》的校勘，当在享保八年六月三十日。时仍在足利学校，开校的具体日期，当是《春秋正义序》第一页第一行右栏外所记：“六月晦日校。时享保癸卯，寓足利学。”此时山井鼎来足利学校已近一年。但山井鼎在享保七年来足利校书之初，就对足利学校藏《春秋左传注疏》有所考察，他在《春秋正义序》前的空白页有长跋曰：（图见封二）

足利所藏《春秋传》亦上杉宪实所寄置，合于五经之数。其板与他经不

同，盖此时未有《春秋》之刻，故以他板足之也。观《礼记正义》卷末跋可见也。足利所藏宋板《礼记》卷末：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兴辛亥仲冬^①，唐备员司庚，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日本享保壬寅九月重鼎志。

时隔九个月，山井鼎正式进入《春秋左传注疏》的校勘阶段。一一排比较本上题写的时间，基本无间断，但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山井鼎的跋识在记载时间、天气、郊游之外，又言及患病之事，仍关乎校书。如《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第一页右栏外记：

鼎也春来患湿臀生疮，偷一旬闲，遂治于上州忍山之温泉。距足利三十里，七月廿一日发此，而晦日归学云。

又卷六十第三十四页之后，自“有山氏”一句起，墨钉满纸，不可卒读，山井鼎据足利本抄补三页，并于补抄后墨笔识曰：

嘉、万二本漫漶不可读也，于是乎据足利学宋板补写。时予臀生湿疮，来治于上州忍山之温泉。賈《礼记》、《论语》、《左氏春秋》校云。享保癸卯秋七月廿九日南海学生山重鼎志。

又《论语注疏》卷二十后题：

享保癸卯秋七月念一日，治于上州忍山温泉，賈皇侃《义疏》十本校雠，廿三日功竣。重鼎志。

疗病仍不废校书，可见物茂卿云“纪人神生夙有好古癖”不虚。这几则题记，“嘉、万二本漫漶不可读”，透露出山井鼎在以明嘉靖李元阳刻本为底本校宋本时，也同时用明万历北监本校勘。“賈皇侃《义疏》十本校雠”，则交代了校勘《论语注疏》的资料。

自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二十日，山井鼎已完成《春秋左传注疏》二十卷之前的部分，疗病回到足利之后，八月二日起，又自卷二十校起，一日内完成二十一两卷的校勘。卷二十第一页“唐孔颖达疏”行上“八月二日校”、第二十七页末“癸卯八月二日来足利校毕”、卷二十一第十一页校“刘歆期交州记”处署“癸卯八月二日足利中校”可证。此后的时间基本连续。若校书有阙，山井鼎会记下原因。如卷四十五第十三页“经十年春”行上记“九月三日校”，下一个日期则出现在卷四十七卷末，云：“享保癸卯九月十二日校雠毕功。”相差九日。原因是“此月天气快晴，游行于近郊，校书旷日云”。自九月十二日至九月二十六日，山井鼎校完卷四十七至卷五十七。卷五十七末页记：“享保癸卯九月廿六日野州足利学校中校。”又用四天时间，校完余下三卷，于九月三十日

^①三山黄唐跋，山井鼎在《礼记注疏》卷六十三末页后空白处亦加以抄录，“绍熙”尚未误作“绍兴”。

最终完成《春秋左传注疏》的校勘。其卷六十末跋曰：

享保八年癸卯九月晦日对校功竣。凡用日子九旬。寻校《毛诗》，欲收功三冬。彼疏太衍长，比于《左氏》为字密也。或其难乎？野州足利学校塾中记写。

从六月三十日始校，至九月三十日完功，恰好三个月。

山井鼎进入《毛诗注疏》的校勘，当在享保八年十月一日。《毛诗注疏》二十卷，以子卷计，共七十卷，山井鼎嫌其疏太衍长，但较之他经，《毛诗注疏》校读为易。从山井鼎题记的时间看，最早的是《毛诗正义序》第一页第一行右栏外所记“享保八年癸卯十月朔”，是日始校。半月之内校完六卷，其卷六之四末记：“癸卯冬十月既望功毕。”又半月，完成九卷，卷十五之二第十六页《白华》后：“享保昭阳单阙之岁十一月朔校。”昭阳单阙即癸卯。再半月，校到卷十九，卷十九之一末页《天作》后：“昭阳单阙十一月既望校。”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毛诗注疏》校完。至此，宋本《五经正义》校讎全部毕功。山井鼎记曰：

《五经正义》总八十八本，对校所输一再或三。始事于往岁八月十三日，终功于今兹畅月廿二日。中间微恙，药饵之给未尝遑暇，魔魅不殄，俾功踰期，为达者嗤耳。时享保八年昭阳单阙十一月廿五日足利学中志。
南海学生山井重鼎君彝父。

山井鼎撰《七经孟子考文》，包括《周易注疏》、《尚书注疏》、《毛诗注疏》、《春秋左传注疏》、《礼记注疏》、《论语注疏》、《古文孝经》、《孟子注疏》。以上据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明嘉靖福建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出现的山井鼎批校跋识，已解决了山井鼎足利校书的起止时间，校勘《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六经的先后顺序及校勘各经的具体时间两方面的问题。《考文》所录《孝经》是古文《孝经》，与此注疏本《孝经》不同；《孟子注疏》校本有少量校语，但没有题写校书时间，所以《孝经》、《孟子》的校勘时间待考。

三、由手校本考察山井鼎对诸经的校勘

以往学界得以了解山井鼎在经部文献校勘上的成果及贡献，多赖《考文》原书，及他书的征引，如卢文弨《群书拾补》、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山井鼎手校本的发现，不仅有助于考察山井鼎校经的事迹，更有助于详考山井鼎校勘诸经的原始面貌，如校勘诸经所用版本、来源、校勘的内容、体例等，可与《考文》互证，同时校本还提供了许多未被《考文》收录的异文、按断，极具价值，今论述如下。

第一，山井鼎校勘诸经最初的底本。据《七经孟子考文凡例》，所称“今本”注疏有四种：正德本（元刊明正德修版）、嘉靖本（明嘉靖福建李元阳刊本）、万历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刊本）、崇祯本（明崇祯毛晋汲古阁刊本），《考文》“以崇祯本为主，参以诸本”。然京都大学所藏山井鼎手校本，其底本是明嘉靖中福建李元阳刊本，且《春秋左传注疏》卷第十九上、卷第二十二，卷端“明御史李

元阳提学金事江以达校刊”一行尚未被挖改，是为闽本之确证，反映了李元阳刻本的原始面貌。

第二，手校本保留了校本来源的详细信息。山井鼎校勘诸经，主要利用了足利学校所藏宋本、古写本及足利学校印行的活字本，《考文凡例》有明确交代。而校勘所用明代注疏本，《凡例》并未说明来源，今手校本有云：

其后与家藏永怀堂板本并校，果然。（《春秋左传注疏》卷七“郑国在江夏”句。）

独予藏永怀堂本作“先王”，似非。（《尚书注疏》卷十九《君牙》“乃惟由先正”句。）

余友伯修藏书万历板本阙二册，似以嘉靖板补，而“本”字作“新”。（《春秋左传注疏》卷五“知非仲尼本意也”句。）

汲古阁本作“近”，赤城藏万历本同汲古阁。予初得武夷藏万历本校之，与赤城藏本间有异同。（《礼记注疏》卷二“不得远也”句。）

既有家藏之书，又有得之友人者，且校勘两个万历本，二本之差异，当是初刊本与重修本之别。

第三，手校本更为明显的体现山井鼎校经以版本对校作为主要方法。据《考文凡例》，山井鼎校经主要内容包括存异、补阙、补脱、正误、存旧、按断六项，手校本呈现的面貌与此一致。而手校本随文批注的条例，则更可看出山井鼎以版本对校作为主要方法及体例之严谨。如《春秋左传注疏》卷一首页页眉及行间，山井鼎注其条例曰：

凡朱笔“足利本”者，足利学所藏《五经正义》，或朱称“宋板”，皆一本也。凡朱笔称“二本作某”者，指足利、万历也。凡称“足利一本”，足利学所藏《经传集解》三要信长老所阅本，其板行亦宋板也，验避讳字知之耳。凡“永怀堂”者，予之所藏《十三经》注本也，多与足利一本合，故墨称“二本”者，指足利一本、永怀堂也。凡本国所行活字板，与足利一本合，故不别称也，此本其源据足利一本行之，明可知也。

山井鼎手校本以朱、墨二色及不同的术语区分版本，如朱笔书“足利本”，朱笔书“二本作某”，墨笔书“二本”，皆各有所指，而《考文》并不反映这些最初的校勘面貌。

第四，手校本保留了大量不见于《考文》的条目。这又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底本的转换。手校本以明嘉靖李元阳本为底本，《考文》转以明崇祯毛晋汲古阁本为底本，“以崇祯本世所尚也”。如此一来，若毛本与宋本一致，只有嘉靖本与其他本不同，这样的条目往往不会收录在《考文》中。试举一例：《尚书注疏》卷十一《泰誓》疏：“日亡吾乃亡。桀杀龙逢无剖心之事。”山井鼎校本朱笔书：“‘乃亡’下宋板有‘矣是桀亦贼虐諫辅谓已有天命而云过于桀者殷本纪云紂剖比干观其心’三十字。‘剖’，宋板作‘割’。”又墨笔书：“汲古阁有此三十字。”《考文》不见此条。今检《尚书注疏》各本，宋刻单疏本、宋刻八行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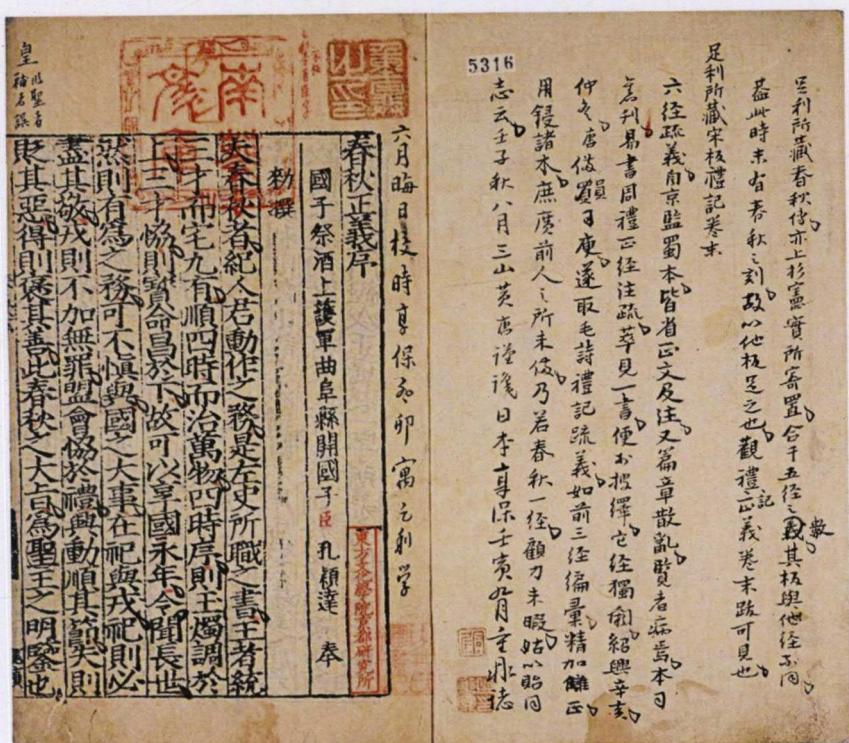
宋魏县尉宅本、蒙古刻平水本、明崇祯汲古阁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清《四库全书》本，“乃亡”下皆有“矣是桀”至“观其心”三十字，嘉靖本脱，万历北监本以嘉靖本为底本，亦脱。清代稍晚于山井鼎的浙江嘉善人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指出此处脱文，其后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亦指出，《考文》不收此条，若不见手校本，则无由知晓山井鼎为最先校出这一脱漏者。

2.《考文》作为汇集山井鼎校经成果的专书，宗旨明确，体例整齐划一，故对手校本所存校勘内容有所选择。以《周易注疏》而论，由单疏本到经注疏合刻本，疏文起讫多有分合变化，山井鼎手校本对此问题亦加以校勘。如卷一《乾卦》“彖曰大哉”节经疏“彖曰大哉乾元至各正性命○正义曰：夫子所作彖辞，统论一卦之义”至“若贵贱夭寿之属是也”。山井鼎于“彖曰大哉乾元至各正性命”行上朱笔书：“宋板无十一字。”“大和乃利贞”节经疏“正义曰：此二句释利贞也”至“言万物得利而贞正也”。山井鼎于“大和乃利贞”行上朱笔书：“宋板与上文连为一节，下有正义，故此下无‘正义曰’三字，与上文疏相连接，下同。”页脚又朱书：“宋板与上疏连。”其后墨笔书：“若贵贱夭寿之属是也。保合大和乃利贞者，此二句释利贞也……得利而贞正也。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者，自上以来……。”今检宋刻八行本，恰如山井鼎所校，经文的疏并非分作三段，而是在“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注文后统作经疏云：“正义曰：夫子所作彖辞……若贵贱夭寿之属是也。保和大和乃利贞者，此二句……得利而贞正也。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者……。”与宋刻单疏本的疏文保持一致。从八行本到十行本，经注疏的体式发生了变化，经疏多被拆分，删去起讫语，另加“正义曰”三字，随附各经文之下。山井鼎对这种变化加以关注，手校本中这类内容很多，但《考文》概不收录，而这些校勘，在考察经书版本源流及体式演变时，是非常有力的证据之一。

3.手校本校出，并有按断，《考文》不收，物观《补遗》补出，但不加按断。如《尚书注疏》卷十八《周官》注：“当思危惧。”《补遗》：“宋板‘惧’作‘惟’。”山井鼎手校本：“‘惧’，宋板作‘惟’，恐非。”同卷注文：“厖，乱也。”《补遗》：“和谐厖乱也。[古本]‘也’上有‘者’字。”[按，物观此处摘句有误。“和谐”二字当属上，作：“俊乂在官，所以和谐。厖，乱也。”]山井鼎手校本：“‘乱’下足利有‘者’字，恐非。”阮元《校勘记》袭用《补遗》，又云有“者”字非，山井鼎先阮元而发之，惜《考文》未收。以手校本与《考文补遗》相较，此类条目甚多，若无手校本，山井鼎的很多贡献就会被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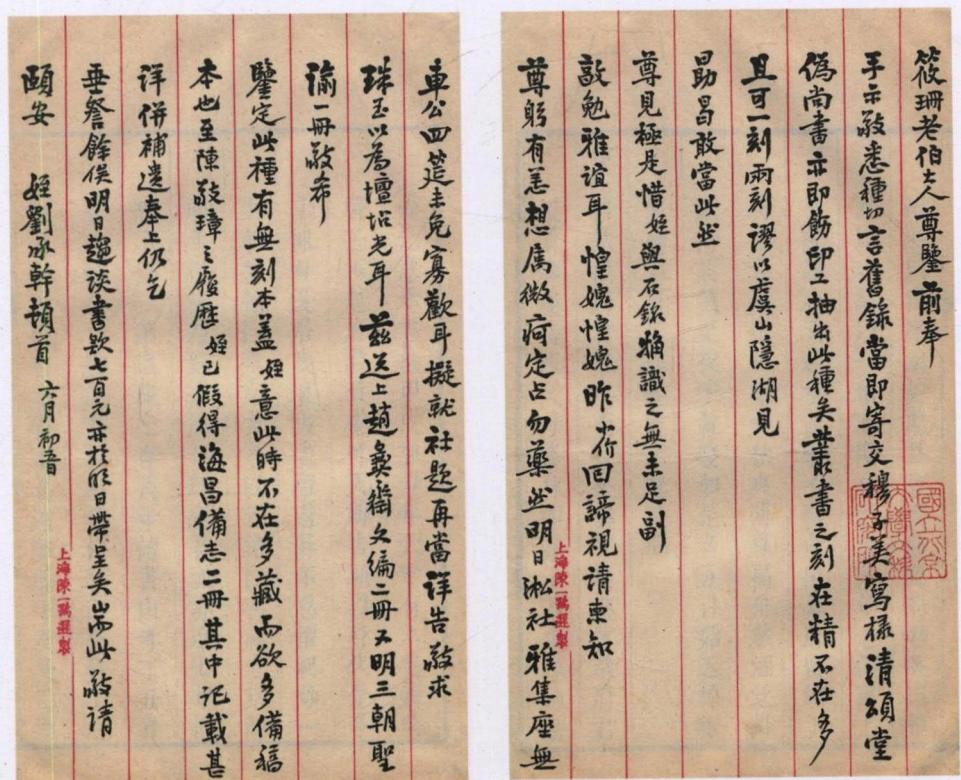
综合以上所论，山井鼎手校本价值巨大。不仅能够为山井鼎校经事迹的考察提供详实的材料，更为重要的是其保存的山井鼎校经的原始面貌，能够最为真实切近地反映山井鼎校经的过程。而手校本保存的未被《考文》收录的校勘成果，也为我们全面考察山井鼎的校勘学，以及从手校本校记到辑成《考文》一书时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重要的依据。因此，山井鼎手校本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系统的比较研究，将是进一步深入的课题。

【作者简介】王晓静，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古籍整理与研究。



山井鼎手校《春秋左传注疏》跋

详参王晓静《闽刻〈十三经注疏〉山井鼎手校本价值考论》一文



刘承幹致缪荃孙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详参吴青《刘承幹致缪荃孙函札考释》一文